

作家

巴金

余思牧 著

增訂本

上卷

國 現 代 作 家 學 術 研 究 系 列

作家

增訂本上卷

巴

金

余思牧 著



作家巴金（增訂本 上卷）

2006年3月初版

著者 余思牧

責編 鍾潔雄

出版 利文出版社

香港鯉魚涌英皇道1065號東達中心1304室

Tel. 2390 9736 Fax. 2390 9465

E-mail: leeman@pacific.net.hk

發行 利源書報社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荃灣德士古道220-248號荃灣工業中心1609-1616室

Tel. 2381 8251 Fax. 2397 1519

E-mail: lysaltd@netvigator.com

美國 華文書報雜誌社

發行 Chinese Periodical Distribution

507 S. Stoneman Avenue

Alhambra, CA 91801 U.S.A.

Tel. (818) 282 0361 (818) 282 0387

印刷 彩迅印務有限公司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Hong Kong



ISBN 962-988-140-3

©2006年 利文出版社



1949年在上海寄寓書房的巴金



巴金的父親李道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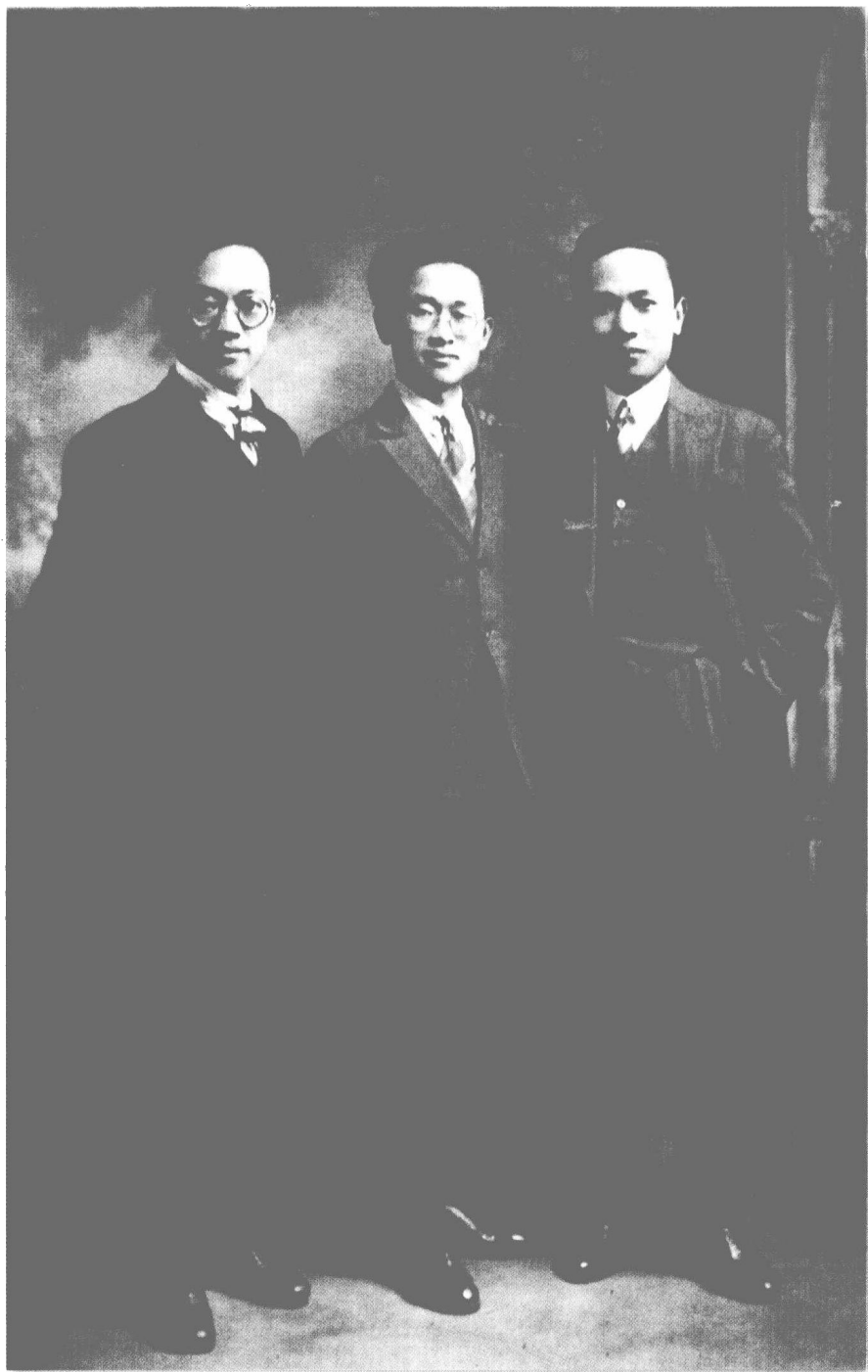
巴金的母親陳淑芳



1907年巴金的家庭合照。前排左一手抱者為巴金；後排右一為巴金母親。



1923年4月，19歲的巴金與三哥堯林離開四川赴上海求學。離家前與繼母鄧景蓮(中坐者)及兄弟們合影。前排左為十七弟堯集，後排左起：十四弟堯椽、大哥堯枚、三哥堯林及堯棠（巴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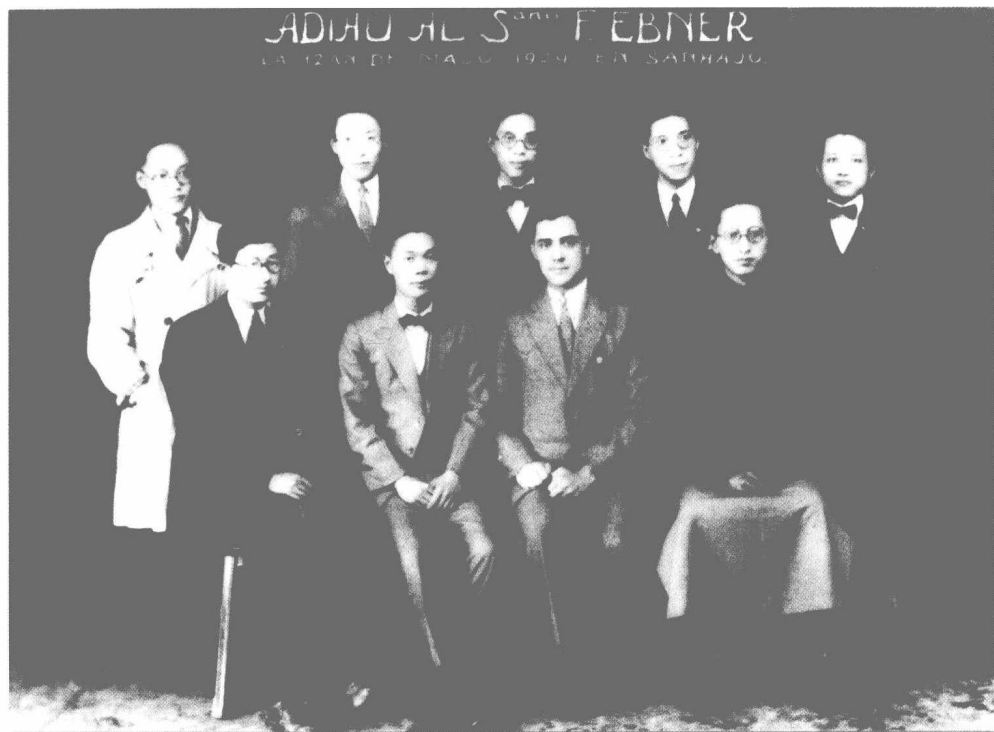
1928年春，巴金與留學法國的中國學生詹劍峰(右)、桂丹華(中)合攝。此期間，巴金正創作小說《滅亡》。

巴金在法國沙多—吉里的
拉封丹中學裏 (1928 年 7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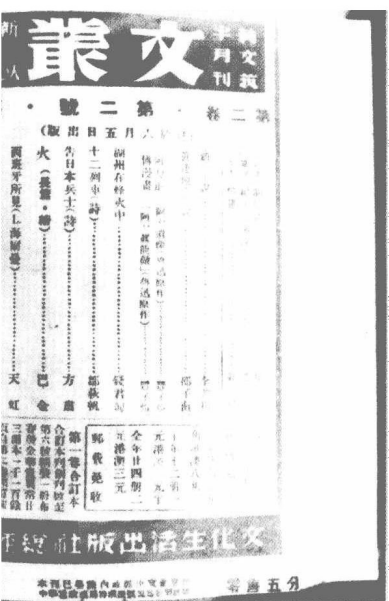
作家
巴金

巴金在上海與世界語學會
會員合影(1929 年)





1933年巴金攝於北平圓明園遺址



抗戰期間，巴金在廣州辦的抗日刊物《烽火》



巴金的第一部長編小說《滅亡》，1929年出版。

作家
巴金



《寒夜》舊版本的封面



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文學雜誌《文叢》，由靳以及巴金主編。

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

巴金



巴金题辞

序 一

《作家巴金》序

陳思和

今年初，我與妻子去香港旅遊，最高興的事是拜會了余思牧先生。我上一次見到余先生，於今已有四年。當時聽他說，要回加拿大去做一個心臟“搭橋”的手術，雖知這也不是什麼危險的手術，但心中常常惦念着；前年春夏，在北京舉行第三屆巴金研究學術研討會，會議籌備人向余先生發出了邀請，但沒有收到回執，似乎聽到一個傳聞，說是余先生身體欠佳——後來才知道他是由心臟通向腹腔與腰椎間的血管動脈上長了一個瘤子，在加拿大經受了一次大手術。因此，我心中更是忐忑不安。這次去香港，不僅是自己抱了要去探望的願望，也帶了巴金老人和他女兒小林對余先生的問候。但我心裏卻毫無把握，不知余先生是在加拿大還是在香港養病，也不知他的身體狀態是否允許接見客人。

可是見到余先生時，真讓人大吃一驚。那天先是相約在彌敦道美麗華大酒店的大廳裏見面，我因為路不熟，遲了幾分鐘到達，一進大廳就看見余先生端坐在沙發上，臉色紅潤，非常健壯的樣子。他引我去另一家酒店的餐館時，不但健步走在我的前頭，手上還提了一個看上去有些份量的大紙袋，邊走邊笑邊說，一點也不像是個隔年動過大手術的七十老人。待坐定以後，他從大紙袋裏掏出一個塑料袋，裏面裝着一大疊書稿，我一看，原來是余先生早年的著作《作家巴金》和近年來他發表的一些文章，因為是影印件，所以特別厚重。余先生告訴我，《作家巴金》自1964年初版後，在海外廣受歡迎，已經印到二十一版，還是供不應求，索書者不絕，所以他打算再印第二十二版，並收入近年來他在商務、疾病雙雙纏身的情況下，堅持研究、評論作

家巴金的最近成果，《附錄》十五篇。這當然是巴金研究領域中值得慶賀的一件事。但我沒有想到，余先生把這一大包影印件交給我的時候，竟囑我為這部書寫一篇序。這就使我汗顏，使我惶恐了。

余先生與我，論輩份，他是長輩；論寫作，他是前輩。我的研究巴金，是讀了他的書受到了他的啟發才起步的。我的《人格的發展——巴金傳》在台灣初版時，就請了余先生為之序，受過他的提攜。現在我有何德何才為余先生的著作寫序呢？當然，我也無法推卻余先生的盛意，所以這篇序的寫來，還不僅是中國文人間向有的投之以李、報之以桃的友誼見證，更主要的，是我應該表達對這部在巴金研究領域有筆路藍縷之功的學術著作的感激之心。

時間過得真快，現在算起來，我進復旦大學中文系唸書，已經有十八年了。這是個王寶釧苦守寒窯的年頭，如果是一個如花似玉的女人，苦守十八春秋，真會像張愛玲所說的，變成了冰箱裏的一條魚；但在人類精神傳承的某些方面，時間不但不會使它乾癟乏味，反而促使它慢慢壯大、豐腴起來。細流漸成江河，全是靠時間的力量。十八年前，我剛剛開始讀現代文學作品，巴金的書一下子就吸引了我。但是若說要激發我進一步研究巴金의思想和創作，並把它作為自己學術生涯的開端，不能不歸功於二部研究文獻。一部是楊風的論文《巴金論》，還有一部就是余先生的評傳《作家巴金》。大約從五十年代開始，巴金研究一直被籠罩在權力支配下的大批判陰影之中。1955年魯迅的傳人胡風及其朋友們受到整肅，1957年，又一批三十年代團結在魯迅周圍的作家、評論家和翻譯家被打成右派，就巴金在文藝界的圈子而言，除了四十年代去了台灣的黎烈文和周索非之外，紛紛落入了“右派”之網，如蕭乾、黃源、蕭軍、馮雪峰……只剩下他與靳以兩人倖免。不久，靳以因心臟病死去，當年追隨魯迅堅持在知識份子獨立戰鬥崗位上的知識份子，只有巴金還享有作家的崇高榮譽。但是他的日子過得並不平靜，在“法斯特事件”中，他因為曾為美國作家法斯特說了幾句公道話而引起權力者的憤怒，緊接着學術界又搞起了一場所謂“拔白旗”的運動，其實是“反右”的餘波，繼續對知識份子進行清除。巴金在文藝界被首當其衝，北京的幾家雜誌連篇累牘地發表所謂“巴金作品討論”，批判他的早期小說，當時最有影響的“大批判專家”姚文元、李希凡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火力不能說不猛烈；

北京師範大學和武漢大學的大學生們在教師的組織下，編出了二本聲討巴金作品的小冊子，有許多深受巴金作品影響的青年人不得不發表文章檢討自己思想犯了錯誤……。雖然巴金研究工作在四十年代就有成果，法國人明興禮的《巴金的生活和著作》已經翻譯出版，但我們那時在大學圖書館裏首先接觸到的，就是這麼一堆垃圾似的研究“遺產”。讀那些面目可憎、文字乏味的大批判文章，絲毫激不起思想的活躍，甚至連厭惡它反駁它也覺得不值得。在這個時候，我有幸讀到了楊風的《巴金論》和余先生的《作家巴金》，就如從遠處吹來一陣春風，頓時感到精神清爽。《巴金論》篇幅不長，但分析中肯、公允、平和，是五十年代難得讀到的作家評論；《作家巴金》則更是以熱情洋溢的文字，系統地介紹巴金的生平和創作，我的印象特別深的是在作者敘述了巴金的生平以後，用極其推崇的口氣作出結論：“所以，我說，巴金是一個偉大的人”。在那個年代裏，“偉大”是毛澤東的專用形容詞，現在移用在一個中國作家身上，確實讓人感到一陣痛快。讀其文思其人，我對楊風和余思牧的名字都懷了默默的敬意，也默默地認定他們才是我從事巴金研究工作的嚮導，我將沿着這樣的學術道路慢慢地走下去。

我的一家雜誌上讀到過一篇回憶楊風先生的文章，才知道他原來是江蘇省的一位教師，死於“文革”中。文章記敘了楊風先生一件事，他在“文革”中被抄家，珍藏的書籍被紅衛兵們當作罪證用三輪拖車運走，當裝書的車拖出院子時，被管制着的楊風先生突然跑過去，從地上撿起一本書，追上去放在車上，還對紅衛兵說：“這本書是配套的，如果丟了一本，以後就不容易配全了。”我讀着這樣的文字，真是感動得身子都坐不住。楊風先生固然天真，他難道就不知道珍貴的書籍落到那些流氓打手的手裏，根本就難逃被毀滅的厄運？但是這種身臨危境卻首先想到保護書籍完整的精神，卻讓我想到了為保衛畫在地上的圓而不惜犧牲生命的古希臘哲人。如果說，中國知識份子當中確實存在着一種權力、金錢、厄境都不能扼殺的人文精神傳統，那麼楊風先生就是一個例子。可惜我無緣與楊風先生謀得一面，但我有幸在香港中文大學做訪問期間拜訪了余思牧先生。同樣是我心儀已久的研究巴金的前輩，余先生的命運比楊風先生要好得多。他五十年代在香港也是一名教師，兼搞文學創作研究和出版工作，境況與

江蘇的教師楊風相差無幾。但1968年以後，正是楊風先生與中國所有的知識份子一併受難的時候，余先生離開香港移民加拿大，棄文經商，待1984年重返香港時，已經成為專對大陸投資及貿易的實業家。但這十多年來，余先生並沒有放棄對文學的愛好和研究巴金的工作。當1988年我們經中文大學盧瑋鑾教授介紹相見時，他竟當着我的面拿出一本我和李輝合著的《巴金論稿》，裏面劃滿了紅色的、藍色的鋼筆線條和文字。我每想起充滿喧囂的商業場上竟有余先生那樣認真於學術專業的知識份子，自然內心也充滿了感動。

我們那天談了許多話，有關於雙方的事業、理想和追求的，有關於香港流行的文化現象的，但更多的是圍繞了巴金研究的話題而展開的。當時我是作了一些筆記的，可惜現在我身在東京，所有資料都沒有帶出，為寫這篇序文，我在早稻田大學跑了三個圖書館和資料室，想找一本收入了巴老與余先生通信的《巴金全集》第二十三卷，結果竟找不到，所以光憑記憶不可能將當時一些精采對話復原。我記得余先生尖銳地批評了香港大學幾位學生關於《隨想錄》的討論，批評他們是太平盛世裏長大的書生，根本不懂得中國的社會現實和巴金創作《隨想錄》的意義；我印象更深的是余先生介紹《作家巴金》一書的寫作背景，它向我展示了另一幅與五十年代的大陸似同非同的文化現象。五十年代港英政府完全站在反共的一邊，努力要阻止共產黨勢力南下，在文化上，香港一度被“美元文化”所控制，即在美國政府的金錢資助下進行反對共產主義的政治宣傳。關於“美元文化”在香港文化發展實際中產生的複雜作用，（包括它在開啟中西文化交流風氣，培養一批新進作家藝術家等方面），我有我自己的看法，以後可以當作學術問題去進一步討論，但在當時的反共環境裏，來自大陸的一切文化藝術都受到的嚴苛限制是事實。新文化運動及其文學創作，也被當作是共產主義的一部份而禁止，以至現代文學研究在台、港學術領域裏至今不盛，皆出於這一政治原因。比較起來，香港似乎還好一些，究其緣故，就是香港有一大批深受五四新文化傳統影響的知識份子，他們利用自己的教育、出版崗位，竭盡全力地將五四新文藝的火種傳播到港島。知識份子依憑着傳統在社會上安身立命的。本世紀以來，中國的知識份子離開廟堂以後，正以幾代人的獨立戰鬥精神，努力實踐着一個新的傳統。這就是五四新文化傳統。雖然五十年

代以後，新文化傳統在大陸、台灣、香港三地因為各種各樣的背景都受到摧殘，但真正的知識份子卻始終沒有放棄過這樣一個精神傳統。余先生五十年代在香港所從事的正是這種薪盡火傳的工作，他和他的朋友們利用編教科書和教學的機會，向學生們講解魯迅、茅盾、冰心、葉聖陶、巴金等新文學作家的作品，由講解到研究，由研究到創作，余先生的《作家巴金》就是誕生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作家巴金》一書是在這樣一種文獻資料並不全面，文化環境又十分惡劣的背景寫成的，而且在主觀上，作者礙於有形、無形的手的干預，也無法真正地暢所欲言。但是這本評傳有一個很好的特點，就是作者並沒有完全按照當時左派的政治教條人云亦云地評論巴金，在許多地方，都看得出作者投入了強烈的主觀情感，把他個人對巴金的觀察、理解、研究一一寫了進去。這些片斷，往往是書中最有意思的部分。譬如，余先生一再說過，因為當時環境的壓迫，他沒法分析和介紹巴金在五十年代以後的創作情況。其實這一點從今天的角度看，也未必是壞事。因為在五十年代知識份子普遍不能說真話的環境下，巴金的許多創作也非由衷之言，研究者在當時是很難作出中肯的評價。如余先生在書中寫到的，當《李大海》出版時，余先生寫信給巴金談了對這部著作的讚美，而巴金卻回信表示不滿，還說：“許久沒有執筆，倒覺得生疏，還望切實給我批評”。我想這倒是巴金要說的真實話。但是余先生在這本評傳中利用了一切機會來傳達有關巴金的最新生活信息，則是很有價值的。如第二章《巴金的家庭》裏，他寫了“新的家”一節，介紹巴金在五十年代的日常生活情況，這對於愛讀巴金作品又極想了解作家生活近況的讀者來說，是一個很難得的信息。我第一次讀到這個片斷，還不是在《作家巴金》這本書裏，而是在另一個香港作家的隨筆集裏轉引述的，可見它在當時大陸與海外信息隔膜的情況下確實產生過較大的影響。在這個片斷裏余先生寫了他對巴金住宅和其婚姻的觀察，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幾年以後我走進巴老的客廳時，腦中立刻就喚起了余先生在書中的這段描寫。

還有，我最喜歡讀書中第六章《巴金的為人》。從人格上描寫巴金，解釋巴金，余先生是第一個。他花了一章的篇幅，專門探討巴金身上的各種品質，關於友情、金錢、工作、國家等等，其中有不少內容都來自他個人與巴金交往中的體會和他在採訪中獲得的印象，這些

第一手資料，都為後人研究巴金提供了珍貴的材料。如在這一章裏，余先生引用了一位香港朋友的話，說“在抗日戰爭期中，巴金生活得很艱苦，有些人又惡意地攻擊他，說什麼巴金投筆從商啊，時時加重他的精神負擔。”我在巴金的文章裏，也看到過他對有人說他“投筆從商”的謠言的駁斥，這裏又一次證實了這謠言的存在。我沒有查到謠言的來源，但我想這謠言很可能與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在抗戰期間有了較大的發展有關。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我倒是想到一個例子，來說明巴老當年“投筆從商”是怎麼一回事。確實，他為了協助朋友們創辦文化生活出版社，為了主編幾套大型叢書，花了許多心血，這間接地也影響了他的寫作（抗戰以後，他的創作數量明顯不如抗戰以前）。但如果這也算作一種“投筆從商”的話，那麼，這正是巴金品格中最寶貴的地方。他以名作家的地位，減少了個人性的文學創作，卻把大量的時間、精力消耗在提攜新進作家、維繫文學新血，在推動整個中國文學事業上面，只要打開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出版目錄看一下就知道，幾乎有一半以上是三十年代中期以後文學史上的優秀創作。抗戰時期物價飛漲，國不將國，從事嚴肅文學創作的作家生活尤為艱難，巴金不但以身作則，決不寫那些通俗賺錢的流行讀物，而且用出版叢書來保護作家們的利益，相濡以沫地維持他們的生活。不用說，巴老在中國文學界的崇高聲望和地位，正是來自這種無私的奉獻。他和他的朋友們創辦文化生活出版社，完全是憑着一個理想，一股熱情而義務奉獻的。在前二年，因為相似的原因，我和朋友們主編了兩套《火鳳凰》叢書，以宏揚知識份子人文精神為宗旨，嘗試着在商品經濟大潮中實踐知識份子的理想。巴老知道我們正是學習了他當年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主編叢書的榜樣，踏着以他為旗幟的知識份子道路在努力工作，他非常支持，不但親筆為“火鳳凰”題詞，而且同意把他在《隨想錄》以後新寫的隨筆集《再思錄》收入《火鳳凰文庫》。當時，九十高齡的巴老正大病一場，昏迷過兩次，但他聽說《火鳳凰文庫》第一輯出版，我們去送書時，堅持從病床上下來，坐到椅子上接待我們。老人手撫着書的封面，深情地回憶他當時編叢書時的情景，他說：“我當年編《文學叢書》，就是靠着一股理想，那時也有人反對，說編這類書不賺錢，結果我還是編了，不但沒賠本，還銷得很好。這說明好書總是有人讀的……”我想，正因為巴老編的叢書深受歡迎，影響大了，才會有